

教育研究資訊

2002年12月 10卷6期 頁19-43

國小師資培育教導的是誰的知識？

—初等教育教科書性別內容的初步檢視

蕭昭君

摘要

本研究針對國內四本初等教育教科書，進行性別內容的檢視。這些教科書呈現的教育知識，既不以女性為研究對象，也聽不到女性主體的聲音。有關教育學者的思想論述，極少提及女性學者，並選擇性闡揚某些男性學者的思想，迴避他們歧視女性的主張。女性在歷史上擔任照養工作的生命經驗，被排除在重要的教育知識範疇之外。女性教師的貢獻也在性別中立的外衣下遭到隱藏。性別角色一再被呈現為社會對性別的刻板期待與規範。有關家庭的論述，充分反映異性戀中心思考，離婚、單親、同性戀都沒有位置，甚至被污名。青少年對性的好奇與婚前性行為被視為「性偏差行為」。職業婦女被責難為社會不安的製造者。

關鍵詞：性別教育、師資培育、教科書、內容分析

蕭昭君，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副教授

真心感謝兩位審查人的意見，讓我有機會看見自己的盲點，我會持續在未來更加努力。

收件日期：91年12月5日；接受日期：91年12月20日

Educational Research & Information

Volume 10, Number 6 2002.12

Whose Knowledge Gets Taught? Gender Bias in Introductory Teacher Education Texts

By

Hsiao, Jau-jiun

Abstract

In this content analysis study, I explore the treatment of gender in 4widely used introductory teacher education textbooks. Women are neither the objects of educational studies, nor are they the subjects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The vast majority of scholars appearing in these texts are males. Male scholars' works are selectively discussed and their sexist statements are concealed or glossed over, while female experiences are excluded from the educational realm. Female educators' contributions are invisible. Sex role stereotypes are normalized. Career women are depicted as the cause of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 Gender Study, Teacher Education, Textbook Analysis

壹、前言：從自省到自我救贖

在這個研究中，我針對國小師資培育的入門教科書「初等教育」，進行有關性別內容的檢視。我的目的不在指控、否定或推銷特定的教科書¹，當兩性平等教育已經成為九年一貫課程中的合法知識，國民教育的場域也開始努地在推動性別平權教育之時，檢視師資培育的源頭，如何經由教科書傳遞性別平權的知識，刻不容緩。這個研究企圖檢視這些教科書如何呈現、對待性別議題，並進一步釐清：誰的觀點被呈現或被消音？在性別教育上，有哪些重要面向、議題並未受重視或完全忽略？教育專業科目教科書，可以如何更完整地呈現或討論女人的經驗，提高女性在教育知識再現上的能見度？

作為一個非師範體系背景出身的師資培育者，我常常自覺在師範體系當中的邊緣處境，除了沒有師範淵源的庇蔭，作為一位女性，整個師資培育課程和教育知識中對女性的存在經驗的忽視、空白、隱藏、扭曲，尤其讓我有一種永遠是外人的疏離感覺。書寫這個報告，反省師資培育，其實就是在反省自己作為師資培育場域的內人身分，企圖在跟自己進行批判的對話。將女性師資培育者在男流教育知識中的困境書寫出來，讓更多的同業了解，以提高女性生命經驗以及相關性別的議題，在教育研究與知識生產場域的能見度，因此變成一個自我救贖的過程，希望透過這樣艱辛的自省，能夠跟關切這個議題的同業一起思考，如何在師範教育課程中，將性別議題從邊緣移到中心，從背景(background)移到前景 (foreground)，更有力道的實踐性別正義。

¹ 在研究的過程中，當我發現到整個師資培育課程是如此綿密地在不同的課程層面，以性別中立的外衣，捍衛父權時，再回顧自己的整個學術社會化的過程，如何假客觀中立之名，行父權文化的洗腦之實，我有一種讀錯書的憤怒。隨即思及自己在誤人子弟數年後，才開始女性主義的自我覺醒，更是良心不安。面對整個社會在性別教育上還有漫漫長路，步入更年前期，眼看學衛生涯與生命的有限，更是焦慮。在書寫這個報告時，更是隨時感受書寫政治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的折騰，師院的同事勸告我，「何必得罪人？」，女性主義的戰友提醒我「世界很小，你不想升等了嗎？」我清楚地體驗任何研究都是政治的存在，無法視而不見，因此也常常陷在如何不讓被檢視的教科書的作者覺得難堪，又能把論點說清楚的困頓當中。這些都是在研究與報告書寫過程中，最真實的存在經驗。

貳、文獻探討：一個有待填補的空白領域

國內有關教科書性別內容檢視的研究，比較著重以中小學教科書為對象，過去十多年來，可以說是持續未曾間斷（李元貞，1993；婦女新知，2001；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黃政傑，1988，1989；歐用生，1989；魏慧娟，1994；蘇芊玲，1997a，1997b；蘇芊玲、劉淑雯，1997）。這些研究共同的發現，長期以來，台灣中小學的教科書，大致而言，內容充滿父權與性別刻板的意識型態，教科書中所呈現的知識，不只是未能反映當前社會變遷中大量女性走入職場，性別角色必須逐漸改變的現實，更是將女性消音，忽略女性對社會的貢獻，女性缺乏可認同的現代角色。至於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與教學，如何形塑準老師的性別意識型態與教學觀，較少獲得關注，也無人針對師資培育教科書內容進行系統性的性別檢視。師資培育機構究竟如何進行性別教育，尤其是知識與權力的議題如何在師資培育課程中細緻的運作，一直是有待進一步了解的議題。藉著這個初探性的檢視初等教育課程的教科書，我希望可以開始填補這個空白。

以美國的研究而言，有關大學教科書的性別意識形態的分析，晚近十多年來一直沒有間斷，從文獻的檢索中可以發現，涵蓋的層面相通廣泛²，雖然領域不同，這些針對大專用書的內容分析研究，卻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發現，女性的貢獻如果不是被消音、貶低，就是被扭曲、刻板化，他們描繪出父權文化如何在高等教育各個學術角落綿密的運作，有待性別平權教育工作者努力反擊。

美國早在 1960 年代末期和 1970 年代初期，教科書中充斥的性別刻板印象，已經開始獲得關注（Peterson & Kroner, 1992），有關師資培育教科書內容的分析研究，則始自 1980 年由 Myra Sadker 和她的丈夫 David Sadker (Sadker & Sadker, 1980) 的研究「1%的解決之道？師資培育教科書中的性別歧視。」(The one-percent solution? Sexism in teacher education texts.)，針對 24 本師資培育核心教育科目教科書的內容進行分析，他們發現：男性出現在這些教育專業核心課程的教科書中的比例，明顯為女性的五倍；除了一本以外，另外 23 本教科書文

2 包括社會學(Beeman, Chowdhey, & Todd, 2000)、心理學(Hogben & Waterman, 1997; Hurd & Brabeck, 1997)、行銷學(Foxman & Easterling, 1999)、傳播學(Wood, 1991)、犯罪社會學(Wright, 1995)、醫療社會學(Barnart, 1995)、師資培育(Sadker & Sadker, 1980; Titus, 1993; Zittleman & Sadker, 2002)、特殊教育(Foley & Safran, 1994)。此外也有針對心理學重要期刊(Gannon, Luchetta, Rhodes, Pardie, & Segrist, 1992)、管理教育題庫(Sims, 1997)呈現的性別內容進行分析。

本針對性別歧視的議題，提供的篇幅少於 1%，可以說是避而不談；24 本中，甚至沒有任何一本教科書教導師資生如何在教室情境中進行反性別歧視的教學或非性別歧視的教學。

在研究建議中(Sadker & Sadker, 1980: 553)，他們懇切的建言：

「如果整個教育專業教科書的目標，志在培育未來的老師，成功的面對一個性別平權班級教學的挑戰，這些教科書必須要平衡、正確地提供有關女性在教育與各個領域貢獻的知識，也必須討論過去教育界對女性的歧視。性別歧視必須被視為當代的問題來討論，性別歧視的導因，以及對男性與女性的影響，都應當全面的分析和討論。徹底、正確、和對當代性別異同的研究，及其對教師教學的啓示，都應該囊括成為課程的內容。更重要的是，教育專業教科書必須要提供清楚具體的課程資源、教學材料，未來的老師才能藉以在教學中反擊性別歧視。」

伴隨著 1980 的研究，Sadker 夫婦甚至致力發展性別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策略(Sadker & Sadker, 1980: 553)：

「基本目的是將性別平等的議題，從師資培育的邊緣遷移到中心，因為性別議題的中心關懷正式落在所有下一代（包括男性和女性）的潛力是否可以全力發展的機會。如果我們接受現階段的存在，也就是教育專科目中少於 1%的性別平權內容，這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另一個研究者 Jordan Titus (1993) 追隨 Sadker 夫婦的腳步，也在 12 年後針對師資培育課程中的教育基礎課程 8 本教科書進行檢視，發現自 Sadker 夫婦之後，那些普遍受到採用的教育導論教科書，對於性別平權的議題，依然不甚重視，暗示教育界人士對這個議題不感興趣。很少教科書的作者提及性別平等的概念，性別平等的概念若非零星出現，要不就是形同不存在；性別歧視與性別壓迫的議題，也未獲足夠的重視；對於社會階層分化和教育不均等的現象探討，也避開對於父權意識形態霸權的批判。Titus (1993: 39) 指出：「入門科目既不挑戰目前的教育現狀，自然也不會去檢視在父權文化下的教育究竟是如何地影響所有學生的身分認同與世界觀的養成。」這些教科書，不談女性教育史，不談性別平等的相關法案，不談女性主義者對學校教育的批評，整個課程清楚地捍衛既存父權文化對於女性的不當壓迫。

進入 21 世紀，David Sadker 和 Karen Zittleman(2002)再度針對 1998 到 2001 年美國出版的教育專業教科書進行檢視，他們慨歎，性別平權教育的進展實在

緩慢有限，自 Titus 的研究發表後，意圖反挫女性權益的論述不斷出現。有些教育入門教科書，甚至特地將這些反挫的論述包括進來，暗示對女性的教育機會平等作為，犧牲了男性的權益，女性主義就是在美國的學校進行「對男童宣戰」(Sommers, 2000)。他們的結論悲觀的指出，師資培育的教科書，跟未來老師在性別平權上的教學之間，似乎只能看到一個「脆弱的連結」(Sommers, 2000:178)。教科書中依然可見性別歧視的論述，象徵性的點到性別議題、女性的角色與貢獻，而且多是負面呈現。當前的這些教科書，根本不足以協助準老師進行有效的性別平權教育。

不可諱言的，在台灣的教育脈絡下，教科書對很多的學生而言，幾乎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知識（學科內容、資料）來源。台灣的學生與老師，長期以來，習慣於接受的教育是：官方（國立編譯館統編本）教科書將「學科知識」「定於一尊」，再以聯考維護、確認統編教科書中的「官方定義的正確知識」(official and legitimate knowledge)的地位。因此，教科書對學生學習到什麼、不學到什麼，確實影響既深且遠。即使晚近開放民間版本的教科書出版，已為各校所知會，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中，甚至鼓勵老師自編教材。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仰賴「單本」教科書當作主要學習來源的現象，仍然主導許多學校教師、家長與學生對何謂知識的認識。

這種過度仰賴特定教科書，甚且將教科書當作聖經的現象，師資培育現場也不例外，不少師資培育者以「單本、特定」教科書當作師資培育課程的教材來源，師資生也相信抱守這樣的教科書，就是學習這個課程的不二法門。教科書因此影響課程如何組織運作，有的教授認知到性別平等的重要，卻不知道可以如何教，因為教科書中沒有這個內容。例如，美國研究性別教育的學者 Patricia、Campbell 與 Jo Sanders(1997)針對科學和數學教育的師資培育者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雖然 90%以上的人認為性別平等很重要，他們每學期的課程中，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的時間卻只有不到二小時。最關鍵的障礙源自於教科書欠缺性別平等的內容。檢視國內教育專業科目的教科書，因此是企圖了解師資培育如何實踐性別教育的一個重要窗口。

參、研究的過程與方法

國小師資培育的教育專業科目包含很多課程科目，這個研究先針對「初等

教育」教科書，進行性別內容的檢視分析。「初等教育」是所有大一的入門課程，我檢視的是坊間四本比較廣為採用的名為「初等教育」的教科書，分別為吳清山著(2001)、王家通主編(1992)、陳迺臣等著(1998)、與呂愛珍著(2000)。

美國最早針對師資培育的教科書進行性別內容檢視的是 Myra Sadker 和她的先生 David Sadker 的研究，利用自己發展出的 72 項目的內容分析量表(Sadker & Sadker, 1980)，1995 年 Myra Sadker 不幸英年早逝於乳癌，David Sadker 則在 2002 跟他的學生 Karen Zittleman，發表另一篇針對 1998-2001 年之間出版與再版的教育專業教科書的內容分析，再度沿用 72 項目的內容分析量表。兩篇研究皆花費相當大的力氣在計算教育專業教科書中性別的明顯內容所佔的比例，兩個研究都是針對文本敘述、書目、圖片、表格一行一行的計量分析，計算多少版面、人物，同時也針對內容的正確性、完整性、與整體性進行評估。研究者之間在檢視時運用這個工具的的信度高達 90%。

基於時間與資源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我所選擇相信質的研究預設，讓我無法也無意進行一個典型的實證量化的內容分析，計算這些教科書出現多少次跟性別有關的語詞、段落、圖片，考驗不同分析者之間的信度³，進行推論。相反的，我和三位準老師將自己埋在行文當中，在不同教科書的文本中來回思索、玩味，有的論述明顯清楚地呈現或不呈現性別意涵，有的論述則比較幽微，必須費心推敲。有時針對性別的議題，在同一本教科書中尋找不同的案例，進行比對。例如，針對學童安全的議題，不同章節如何呈現性別與空間的安全面向；或在四本不同的教科書中，針對相同的主題，進行性別面向的比對。例如，以教師這個主題，不同的教科書，如何呈現女性教師的經驗。在資料分析時，Myra Sadker 和 David Sadker(2000)夫婦在他們的教育導論教科書「教師、學校與社會」(Teachers, Schools and Society)一書，所詳列的七種偏見再現的形式：「消音」(invisibility)、「刻板化」(stereotyping)、「選擇性與失衡」(imbalance and selectivity)、「違背真實」(unreality)、「片段與孤立」(fragmentation and isolation)、「語言偏見」(linguistic bias)、「美容性的偏見」(cosmetic bias)，則協助我更細緻地覺察教育專業科目的教科書中的性別歧視內涵。

³ 我跟三位具有性別平權意識的女性準老師，利用近一個學期的時間，每週以讀書會的方式，深入不同的教科書，進行性別內容的檢視。雖然不是實證量化的信度檢證，我們四個人的討論，往往有取長補短、互相澄清、質疑的功效。這些討論構成我在書寫這個報告的基礎。感謝張碧珊、黃心瑜、蕭幼丹的協助。

肆、研究發現：在師資培育知識中，沒有女人的位置？

整體而言，在性別中立的外衣罩頂之下，這些教育入門教科書所呈現的教育世界，沒有女人的位置。初等教育發展史中，極少關切女子教育的處境，女人好像不存在。教科書所引介的過去或當代學者的思想論述，例如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時，絕少女性，同時選擇性的闡揚某些男性學者的思想，卻極力迴避他們歧視女性的主張。女性在歷史上擔任照養工作上的生命經驗，被排除在重要的教育知識範疇之外。甚至在切身的台灣脈絡下，儘管國小女教師的比例自 1981 年首度超過 51%，持續成長到 2001 年高達 67%（教育部，2002），女性教師的存在現實以及她們對台灣教育的貢獻，都在這些教育專業知識教科書行文中被隱藏、忽視、空白。這些教科書呈現的教育知識，因此是沒有女人的知識，既不以女性為研究對象，也聽不到女性主體的聲音。在相關心理學篇章中，只傳遞男人的生命發展知識，用男性的發展框架，解釋女性。女性心理學者的研究被選擇性的消音。性別大多被當作一個生理變項，男女有別的差異內涵，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形塑教師的教學行為，絕少獲得關注。這些教科書也絕少提及晚進在台灣許多相關法案對婦女權益的修訂，不提社會及文化對婦女的控制議題，更不會討論社會中性別歧視的根源。

在有限提到性別議題的篇幅中，則是相當片段與孤立，卻又在這些片段中，清楚地看到父權價值一線貫穿。例如，點到「性別角色」時，將性別角色一再呈現為社會對性別的刻板期待與規範，同時將之正常化，暗示既有的存在就是合理正確的，再製既存性別權力不平等的現實。點到性教育、愛情觀、家庭觀念時，充分反映異性戀中心思考，離婚、單親、同性戀都沒有位置，甚至有被污名的傾向。點到性教育時，要不就是避而不談，或將青少年的任何對性的好奇、與任何婚前性行為「問題化」，視為「性偏差行為」，貶低情慾教學的重要性與可能。職業婦女也被責難為社會不安的製造者。換句話說，這些教育入門的教科書，在客觀專業中立的語言包裝下，似乎比中小學教科書更看不見女性，以更高明的手法，幽微地傳遞父權思想的意識型態，連師資培育者與準老師都不自覺它的存在。

整體而言，這四本教科書⁴，透過一種看似客觀的專業抽象語言，和性別中立的預設，共同呈現的性別內涵，反映的是再製明暗互見的父權意識形態。在初等教育知識的各個層面，不管是在初等教育的歷史、理論基礎、制度、與實務工作上，很難找到女性的足跡，卻可以清楚的看見父權的思維，光明正大進入教育的討論。在表面上看似與性別無關的其他地方，卻也看到隱含的父權影子，微妙地但又毫不客氣的在其中起舞。基於篇幅限制，我先簡略提出十個發現。

一、在強調認知理性的教育定義範疇內，排除女性教養的經驗

綜觀這四本書在探討初等教育範疇時，一致地以教育學者專家的專業語言論述，雖然意圖價值中立或意識形態中立，卻清楚可見因為不去挑戰既有的父權中男女不對等的存在，形同從認可父權價值的角度討論教育，如此地書寫可能送出的訊息是：性別教育跟初等教育沒有直接關連，或是性別教育不是重要的教育。以吳書而言，兩度提及國家意識民族精神教育才是重要的教育（1999: 9, 12）。雖然，國家意識往往也是實踐父權的同義字，卻又是隱而不談的。

另，吳書引用英國哲學家皮德思（R. S. Peters）的三大規準，「合價值性、合認知性、合自願性」才叫做教育。「凡是違反這三大規準，便是反教育」（1999: 7）。美國女性哲學家 Jane Martin（1982）在深入檢視有關西方教育史哲思想的著作時，為文質疑皮德思的這些規準所定義的教育。Martin 論證指出，皮德思所談的教育其實都是在談跟男性有關的教育，他所謂的一個有教育素養的人(an educated man)，其實就是指男人(man)，皮德思所定義的重要教育範疇，排除掉了人類歷史社會上的另外一種跟養兒育女有關（reproductive process）的教育知識，養兒育女工作長期以來主要都是由女性在承擔，女性因此也發展出屬於女性觀點的教育知識。但是因為不見得完全符合皮德思的規準，所以就不被認為是重要的知識。依照皮德思的規準，我們就不會將女性在養兒育女中所進行的教育活動，認為是有什麼重要意義的。因此，女性傳統的這個教養角色是微不足道的。合認知性的規準，強調教育中的理性認知活動，才是重要的概念，更

⁴ 在本文後續的分析中，以吳書代表吳清山著(1999)，第二版、以王書代表王家通主編(1992)，初版、以陳書代表陳迺臣等著(1998)，初版二刷、以呂書代表呂愛珍著（2000），初版十一刷。由於這些教科書的章節主題，內容大同小異，我以吳清山的教科書為本，從每一章的主題內容，分析它呈現或不呈現的性別議題，再對比其他三本的教科書，如何呈現相關的主題。

讓女性所承擔的養育照顧工作不夠合認知性，因此也是不理性的存在，母親及其教養工作就是沒有知識、沒有理性的存在。

Jane Martin 認為，這樣蓄意排除女性經驗來思考教育、定義教育、進行教育活動與研究的方式，反映的是一種偏狹的男性教育的觀點，當女性的教養活動與經驗，被排除在教育的範疇之外，整個教育領域範疇的界定標準，是男性的活動與經驗，它就變成了所有人類普同的規範。這種貶低女性、排除女性的教育觀，男性因此也無法學到養育的知識，社會原先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再度獲得強化。男女兩性也因此沒有機會學習到諸如蒙特梭利這樣的女性教育家的思想。當我們的教科書只單方面去脈絡化地單引哲學家皮德思的標準，卻不見 Jane Martin 這樣有洞見的批判，這又說明什麼呢？

二、在悠久的教育史中，找不到女人的存在

在有關歷史的論述中，吳書、王書、呂書皆有篇章觸及，都分別從我國和外國的歷史發展來看。吳書所立足的歷史觀，是「遙遠的朝代中國」的史觀，不管是與台灣近代與當代初等教育的演變，尤其是女性在初等教育中的處境，皆空白處理。呂書以一句話點到清末女子小學的設立，開男女受教機會平等之先河（2000：51）。陳書（1998：132-133）與王書（1992：80-81）各以二頁的篇幅討論到日據時代的台灣初等教育，但皆在述及皇民化的不當，沒有提及女性在殖民社會的教育處境，是被困在種族與性別的最底層；所提供的就學人口與就學率的資料中，甚至看不出女性的比例⁵。這樣沒有台灣歷史觀與沒有女性觀的論述，如何讓國內的準老師「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初等教育，將有助於對於初等教育有更深入、清晰的了解。」（吳清山，1999：47），答案是令人擔心的。

在「西洋的初等教育發展」部份，可以說是承襲西方的教育史中省略性別

⁵ 事實上，日據時代到終戰後，台灣的初等教育，已經相當有規模，男女學童就學率比起同一時期的中國，遠遠進步超前（李筱峰，1996：281；張國興，1996：64-65）。張國興研究日據時代台灣社會的變化指出，1899年的統計資料，在台灣的私塾和小學生中，「女生佔不到1.5%，這就是儒教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及天下全是文盲愚民的最好寫照。台灣的近代化，要從打破這種前近代的文化環境起步，教育的任務實在真重大。」（張國興 1996：64）日本人因此開始在台灣推行近代教育，「台灣社會開始近代化的1920年，台灣人男子的小學就學率為39.1%，女子為9.4%。至1943年，男子的小學就學率已高達80.9%，女子也提高到60.9%。」（張國興 1996：65）游鑑明（1988）研究日據時代台灣的女子教育指出，被納入殖民教育的女子教育，內容非常狹隘，忽視種族與性別不平等，呈現非常偏頗不公的情形。

的討論，婦女和女孩遭到教育史的拋棄(錢樸譯，1995)有關。吳書的資料(1999：53-55)呈現的是有錢男人教育的歷史，除了提到羅馬時期「母教其女習織」、希臘化羅馬教育「男女兼收」以外，在這個章節看不到女性教育的歷史。例如，在斯巴達教育的引介中，只說明斯巴達如何鍛鍊男生的體能，卻選擇避開斯巴達教育對於女子教育的強調。近代西方婦運人士如何爭取受教權的歷史，也完全忽略⁵。

三、在心理學、哲學、社會學的理论引介中，選擇隱藏男性學者歧視女性的論述

整體而言，各書的作者在論及不同學門的基礎知識與初等教育的關係時，多是摘譯或摘錄西方相關學理、概念，不只繼承西方男流知識的偏見，也極少將這些充滿專業名詞的學理，具體的與台灣教育現場的學生真實的存在相連結，更欠缺批判這些學理知識對於了解台灣的學童是否妥當。所有的四本教科書，對於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三個領域當中，女性主義的學者如何挑戰這三個領域的男性獨霸的知識觀，則完全沒有觸及。

有關西方心理學的討論，四本初等教育的心理學篇章，必然提到的四種發展學說是艾利肯孫 (Eric Eric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性心理分析論、郭爾堡 (Lawrence Kohlberg) 道德發展理論、和皮雅傑 (Jean 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論。從性別內容檢視，可以發現他們呈現人類的生命發展知識時，從各個層面細緻的反映西方白種男人的心理學知識，不只欠缺西方女性的聲音，也欠缺西方女性的各種行為發展的存在經驗。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 Carol Gilligan (1982) 在她的「不一樣的語音」這本書中批判指出，那些影響深遠的發展心理學家，包括佛洛伊德、艾利肯孫、皮雅傑和郭爾堡不只是身為男性，他們所提出的理論更是明顯的存在男性偏見，不但不直接用女性當樣本，女性的資料被迫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生命發展觀中，

⁵ 關切性別議題的師資培育者，因此可以從這樣的論述繼續深化，引導準老師去思考，為什麼歷史資料中都是男性的歷史？為什麼大部分的過去的社會，女生沒有或只有非常有限的受教育的機會？當代女性受教育的機會雖然增多，但是為什麼教育資源仍然可見男女不對等？父權文化的歷史，為什麼幾千年不墜？重點在引導準老師去看見：以前女性受到限制，沒有機會接受正式學校教育，或機會有限，導致女生成就有限，並非女性先天能力不如男性，女性也缺乏寫書發表意見的能力與資源，因此在歷史上的能見度有限，鼓勵女性書寫自己的歷史，因此也是很重要的教育目標。林玉體教授所著的西洋教育史中，有些段落提到女子的教育，會是這個章節很好的補充資料。

勉強填塞解釋，甚至被視為不正常、偏差⁶。心理學界有關生命週期的發展理論，無法有效的解釋女性的生命經驗。

整體而言，心理學的篇章，選擇避開有關女性主義的心理學對女性深入研究的資料，卻一再強調這四個人的發展階段論，漠視對女性的研究(study about women)重要，例如 Gilligan(1979)批判指出：這些男性發展模式理論上的偏差，助長強調人類行為中的自主(autonomy)與成就(achievement)面向的發展，犧牲了親密與感情依附(attachment and intimacy)面向的發展。這些資料，對於協助我們理解台灣教育現場女性的心理，其實是相當有限的。我們不知道女性經歷何種的心理行為發展過程？她如何推理、歸因、解釋自己的想法？女性有哪些獨特的生命經驗？藉著先天差異加上後天更多的學習，女性如何思維？

作為一個女性教育工作者，在面對這種反映西方白人男性的教育心理學知識，我有類似被雙重殖民的壓迫感，也終於找到自己跟教育心理學的知識雙重疏離的原因。在台灣的師資培育現場，我們被迫學習牢記西方(大部分是美國)的學理、死背男童男性的發展知識，奉之為教育心理學的經典論述，卻看不到身處在台灣教育現場的自己，看不到身處台灣教育現場的女性學生。我們需要更多關照本土的女性的生命發展經驗的研究，像 Gilligan 所呼籲的，只有在心理學理論的發展與研究方面，全面有系統地關照女性的生命經驗，才有可能將這些關照全面的整合，進而發展出一個比較平衡的人類發展的知識。

另外，這四本初教的心理學篇章，也完全漠視女性作為心理學知識生產的主體，隱藏忽略女性心理學家的貢獻，只選擇性地呈現男性心理學家的論述。所引用的偉大的知名的心理學者中，沒有女性的論述作品(study by women)。最明顯的例子是，提到心理學有關道德發展的研究論述時，言只稱郭爾堡。郭爾

⁶ 例如，Gilligan 駁斥 Kohlberg 的階段論過度窄化，大部分反應的是男性的道德觀。Kohlberg 在他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假設性道德難題，當女性必須回應這些難題時，女性的答案跟男性的答案在品質上相當不同，在 Kohlberg 的第五、第六階段的發展中，強調的個人的權益以及對道德難題所提出的客觀公正的解決方法，反映的是男童的社會化過程中所強調的競爭遊戲以及過度沈溺在規則中的成長經驗。相反的，女童的社會化過程中，她們學到的是如何放棄某個遊戲以及更改遊戲規則，以便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樣的經驗也導致女性在道德成熟階段所展現出的「一種不同的聲音」，也就是一種責任觀，關懷那些你本來可以幫助卻還沒有幫助的人，關懷那些我們已經努力公平客觀提出解決策略卻還沒有解決的衝突。發現男生和女生在道德推理過程中展現不一樣的道德判準，男性的道德思考比較著重在個人的權利，女性的道德思考則著重在個人對於他人的責任。因此，Gilligan 指出，在任何道德難題中，女性比較偏重自我犧牲和利他主義來解決，男性則強調權益和規則。從 Gilligan 的立論中，我們知道這不是哪一個道德思考模式比較優秀正確的問題，而是男生女生的思考方式不一樣。但是，這樣的觀點卻被選擇性地隱藏了。

堡的理論，確實是任何教育心理學教科書當中，應當交代的內容，但是，自從1980年代前後，Carol Gilligan 發表她深入的檢視從佛洛伊德、艾利肯孫、郭爾堡、皮雅傑等人如何進行研究、如何解釋研究，或他們的研究如何影響後來的男流的心理學研究範疇，最後出版成她的名著「不一樣的語音」(In a different voice) (王雅各譯，2002；Gilligan, 1982)，她提供心理學界以及教育心理學界「另一個」了解「另一半」人類行為的重要依據，她的影響簡直就是心理學界的知識派典的轉移 (paradigm shift)。

另外，入門教科書只呈現佛洛伊德，卻避開 Karen Horney 對他男性觀點模型理論的挑戰，和 Nancy Chodorow 的研究，在認知方面，Belenky、Goldberg 和 Tarule(1986)也提出「女性的認識方式」(Women's ways of knowing) (蔡美玲譯，1995；劉惠琴，1999)。在心理學的相關篇章中，必須要公平呈現一個企圖以女性的生命經驗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知識。否則，台灣的學生是無從得知這些偉大的女性心理學家的觀點，或也可能不知道原來偉大的心理學家也可以是女性。

至於在哲學理論上，只有吳晝 (1999) 與王晝 (1992) 提及。吳晝 (1999) 在學理基礎上中所摘要呈現有關這三個領域的資料，處處說明這些知識都是男人的知識與觀點，所提到、點到的學者或人物全為男性⁷，兩書對於晚近西方女性主義的發展，對於教育思想的衝擊，皆無提及，因此女性主義與教育的辯證歷史，是不存在的。教育哲學界並非沒有偉大的女哲學家，而是教科書選擇忽略女性哲學家的思想。國內研究教育哲學的師資培育者簡成熙 (2002) 提及，

「大概在1980年以後，教育哲學的領域才開始有女性教育哲學家投入。J. R. Martin 早年受分析哲學的訓練，她擔任美國教育哲學學會的主席，在1981年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主席年會論文。從分析到女性主義，教育哲學歷經了典範的轉移，教育哲學的學術園地，不斷被女性主義學者「入侵」。同一時期，哈佛心理學者 C. Gilligan 及史丹福教育學者 N. Noddings 也在

⁷ 包括：羅素、葉學志、G.F. Kneller、柏拉圖、亞里士多德(p.21)；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康德、杜威等(p.23)；黑格爾(p.24)；培根、洛克、懷海德(p.25)；皮爾斯、詹姆士(p.26)；齊克果、雅斯培、沙特(p.27)；維第根斯坦、卡納博(p.28)；蘇格拉底、施勃郎格、杜威、孔子、孟子 (p.31)；皮亞傑、郭爾堡、馮德(p.31)；華森、史肯納、馬思洛、羅吉思 (p.32)；皮亞傑、布魯納(p.33)；孔德 (p.34)；馬克斯、米德、柯萊、布魯默 (p.35)；國父 (p.38)。王晝則是提到或引到王連生、黃國彥、柏拉圖、皮雅傑、鄔坤如、呂俊甫、曾志朗、趙一葦。

1980年代初發展「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以對抗L. Kohlberg的「正義倫理學」(ethics of justice)。Kohlberg所提出的道德認知發展論承繼J. Piaget的傳統，一直是教育學圈中最主流的道德教育勢力，Kohlberg的道德理論被視為是反映了西方白人自啓蒙運動以來的主流價值。……Martin自述其從分析哲學轉向女性主義的「返鄉之旅」(Odyssey)時，才自我省察到，她在哈佛唸教育哲學時(其時分析的教育哲學是主流的勢力)，並未特別留意性別的問題，在1970年代末，她才驀然質疑，為什麼在唸教育哲學、思想時，很少唸到女性，為什麼媽媽、祖母的育兒智慧，難登學術大雅之堂？而開始對傳統教育哲學家從柏拉圖到盧梭，從當代分析哲學的主流論述中走出，建構以女性為主體的教育哲學。」

簡成熙所提及的在晚近對於教育哲學與心理學都有革命性思考影響的這些女性學者，尤其是Jane Martin深入解構教育哲學與思想上的論述，如何將女性作為一種主體與客體的存在經驗完全排除，完全隱而不見，提出很多發人深省的洞見，但是在這兩本教科書的哲學篇章中，這些偉大的「女性學者」是不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吳書(1999：23)引用另一個學者的說法，特別強調「哲學家大多同時即是教育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康德、杜威等。」。實情是：柏拉圖主張性別平權教育，但是亞里士多德、盧梭則非常貶低女性的價值，令人不解的是，吳書皆不曾提及這些學者的學說中有關性別的論述。雖然吳書援引林玉體教授所著的「西洋教育史」一書說明西洋初等教育的發展，但是，林玉體也在該書中詳細提供不同時期的女子教育的發展狀況，就前述這些男性哲學家或教育家針對女子教育的論述，提供詳細的說明。只是，吳書皆選擇避開這個部分的呈現。因此，當教科書將這些學者貶低女性的論述隱藏起來時，主張貶低女人的哲學家就反而「被推崇」為教育家。舉例而言，吳書推崇盧梭的大著愛彌兒(Emile)的教育「可作為哲學驗證的場所」(吳清山，1999：23)；但是，對於盧梭在這本大著第五章歧視女性教育的論述，卻完全沒有觸及。另，由女性學者書寫的呂書(2000：60，64，65，215)，至少四度推崇盧梭的愛彌兒教育理念，但是完全迴避這本書中的沙豬論述，讀者不會知道

同一本書中的蘇菲雅篇章如何貶低女性的存在⁸。當許多教育專業課程的教科書，在不同科目中，一再地傳遞歌頌西方這些偉大男性哲學家兼教育家的思想，同時又故意閃避呈現他們思想論述中對於性別歧視的觀點，避開將這些觀點攤開在整個父權文化歷史中進一步討論，這不只是偏頗不公，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誠實的。

在社會學理論上，呂書、王書、吳書皆有觸及，大都以結構功能論的預設出發，提及學校教育的社會化功能，在於「有效教導學童學習在社會環境中應履行的社會角色」（呂愛珍，2000：167）、「培育公民特質，進而促使社會安定」（王家通，1992：117），不只未見批判既存社會性別權力不對等的問題，更未見任何晚近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家對於社會學反映男性主流知識的反省⁹。

四、在學校組織與制度中被隱形，封殺女性的貢獻

這四本書皆用很大的篇幅、圖表，陳列不同規模學校的行政組織與人員編制，但在這種去性別化的、客觀的組織層級編制圖表陳列中，只可看出各處室的名稱，卻看不見性別角色期待如何影響這些教育工作人員的性別分佈，尤其是女性主管在領導上所面臨的挑戰（劉鳳英，2000）。事實上，國小以女性教師佔大多數，低年級的導師也大多是女的；男老師雖然相對人數較少，卻佔大部份的行政管理職務；在校長、主任、組長的人士安排上，甚至有特定性別的刻板，例如輔導主任以女性居多，總務訓導以男性居多。前述這些現象，都應當是在這樣的主題中進一步探討並加以突破的。另外，依法，當前各校也都必須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這樣的資料有必要加入這些組織圖表當中。否則，

⁸ 林玉體在西洋教育史一書中（1993：310-311）提到：

「盧梭在愛彌兒一書的末章，敘述了女子教育。他以愛彌兒的未婚妻蘇菲亞的教育來說明他對女子教育的看法。首先，他認為男女在『自然』上就有差異，因此，愛彌兒的教育並不適用於蘇菲亞，蘇菲亞的教育應另成一體系。男強女弱，這是天性使然，勉強不得。所以，女子應該以順從、迎合與取悅男人為天職。『經由談話、舉止、外貌、及姿態等，深入了解男人的內心』不得拂逆男人意志，要忍辱負重，勿怨勿尤，還應曲意奉承，體認出『只有丈夫在側，她才有意義，也才有價值。』雖然婚前可參加宴會或舞會，但婚後應以照料丈夫為主，必須留在家中，不得在外拋頭露面。平時應當學習手藝，養成勤勉習性。『她最喜愛的工作就是做緞帶，沒有一樣工作比這項技藝更適合她的性情了，並且如此還可使她的手指纖細靈巧』，如能會唱會舞來使男人歡樂，則尤屬難能可貴。」

⁹ 從性別的視野出發，討論社會學跟初等教育的關係時，「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Abbot & Wallace，1990 原著，張君攻等譯，1995）一書，以及「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Johnson 原著，成令方等人譯，2001）皆是很有洞見的參考資料。

去性別化的、客觀的組織層級討論，即有可能不自覺地承認既有性別刻板存在的合法與合理性。

五、在課程與教學的論述中，以客觀技術的外衣，規避性別議題

四本教科書皆在引介課程的基本概念，企圖釐清課程、教材、教科書的概念。大部分篇幅都像解釋名詞，課程停留在客觀抽象的理念，無視於國內針對小學教科書內容的研究，一再指出國小教科書內容充滿不當、偏頗的性別刻板意識形態與現實生活脫節等等的發現。但是，這四本書絕大部分的篇幅選擇漠視既有的相關研究結果。唯一例外的是，只有王書(1992：220)中的歐用生教授以兩行文字，在說明空白課程的概念時，以我國小學教科書將女性的角色地位和貢獻隱藏起來為例。雖然陳書(1998：221)在教科書的缺點中，提到內容的偏見，因為漠視國內過去的相關研究發現，所以錯失一個機會具體指出教科書中父權意識的偏頗。

值得注意的是，吳書引國內課程學者歐用生、黃政傑有關課程概念的介紹，這兩位學者過去在台灣的研究論述中，針對教科書中不當的性別內容，皆曾深入研究批判（歐用生，1988，1989；黃政傑，1988，1994），他們也提供後續研究相當大的引導啓示，甚至對於後來台灣的國小教科書在性別內容的修正上，不無影響。但是，吳書只選擇引用這二位學者的學理概念，卻沒有針對他們在教科書性別內容分析的研究著墨，而是將課程的概念當作客觀中立的知識，抽象的引介。誠如吳書(吳清山，1999：220)在文本中引述歐用生所說的，隱藏課程大部分是有意的，其意圖性值得研究。因此，這些教育專業科目將性別議題空白隱藏的現象，其意圖也是可議的。

六、性偏差行為的論述，排除青少年情慾的可能

吳書在「社會變遷中的初等教育課題」中引述其他學者的研究，列舉六項青少年偏差行為，提醒這些偏差行為在國小階段也逐漸浮顯出來。這確實是值得注意的社會變遷。但是，其中對於「性偏差行為」的論述預設（吳清山，1999：40），「(3) 性偏差行為：閱讀黃色書刊或觀看色情錄影帶、與異性發生關係。」其實是有待討論的。另在「學生偏差行為的輔導」（吳清山，1999：236）中，再度提及偏差行為包括「性不良行為」等反社會行為。吳書甚至指出，性不良行為是學生偏差行為中較為嚴重者，無法預防，必須接受治療。但是，讀者無法

從他的說明中了解何謂性不良行爲，從誰的觀點而言是不良。呂書(呂愛珍，2000：165)則將手淫「問題化」，視爲壞習慣。

這樣的論述，很容易再製對青少年情慾需要視而不見與壓抑的保守說法。爲什麼「閱讀黃色書刊或觀看色情錄影帶」，就是「性偏差行爲」？誰來決定這樣的行爲偏差？這樣的觀看行爲，可不可能是因爲學童想要對自己的身體進一步的了解，卻苦無管道的一種途徑？當大人將之定義爲偏差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去正視到學童可能跟我們有不一樣的觀點與需要？青少年的情慾，該不該獲得教育工作者的重視？情慾教學可以如何進行，才能協助青少年建立正向的自我與他人的親密關係？身爲大人，我們對於黃色書刊或色情錄影帶不好的說法，例如，物化女體、將女人當成性商品、醜化窄化男人等等，究竟可以如何有效果地傳達到對自己的身體好奇的青少年心中？這些其實都是很重要性別教育的議題，也是初等教育工作者必須及早準備好以便面對青少年的問題。但是，教科書這樣的論述，極易排除掉如此發問的可能，甚至排除了尋找答案的可能。

這個論述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與異性發生關係」是性偏差行爲的論述，絕非指說與同性發生關係就不偏差，而是這樣的論述預設所有的青少年應該都是異性戀，因此形同將同性戀族群視而不見。

七、在性教育論述中，清楚反映強迫異性戀機制，污名、排除同性戀的存在

在有關性教育的論述中，吳書(1999：72)引國內其他人的立論指出：

「在小學高年級階段，部分學生隨著身體的早熟，對異性同學逐漸感到好奇，有時還會出現不雅或不規之行爲，這可能是生理與心理發展不協調所致，或者對性知識認識不清……所以給予正確性教育知識可能是很重要的。所謂「性教育」並不是性行爲教導的教育，它是一種兩性教育，也是一種生活教育，教導大家如何扮演自己的性別角色，如何認識自己及異性，學習和異性相處之道及建立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它除了包括生理層面，還包括心理層面及社會層面。」

前述描繪的正是同儕性騷擾現象，但是在隨後的篇幅中，吳書完全不曾提及身體自主權的概念。所謂的「教導大家如何扮演自己的性別角色」，也預設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如果主流的性別刻板角色、權力不對等，未經解構，也未經重構一個性別權力對等的角色期待與分工，那麼如此的論述往往流於承認既

有的性別權力不對等，不同的性別應有不同的扮演方式，「女生要有女生的樣子」、「男人要有男人的樣子」，這樣的性教育只有再製父權男尊女卑的傳統文化。整段的論述，也清清楚楚地站在異性戀的預設下，相同的例子出現在呂書（2000：164）的兒童性教育章節中，「……啓發兒童對異性產生高尚的互相敬愛觀念。」如此的論述排除了對同性同學感到好奇的人，也將所有的人都預設在一個標準異性戀婚姻的必然軌道上，反映的是強迫異性戀婚姻機制的主流思維，將同性戀、單身、不想結婚建立家庭的人，排除在性教育的論述之外。

同性戀除了被排除消音，也被污名化。吳書（1999：81）引介佛洛伊德的人格發展分期，其中「5.兩性期（genital stage）：十一歲以後 在此階段個體已進入青春期，由於生理逐漸成熟，已具有生育能力，對異性開始感到興趣，喜歡參加兩性活動；若不能順利度過性器官期，則會有暴露狂或同性戀人格。」在這一部份吳書只有摘要呈現佛洛伊德的說法，沒有進一步解釋或駁斥大師的理論，大師的理論形同高深的真理，當讀者努力在消化大師高深的學理說詞時，也被迫在大師異性戀的真理當中生吞活剝而不自覺，同性戀被解釋為是某個人不能順利度過性器官期，才出現的「問題」，而且因為書中指出（吳清山，1999：79）佛洛伊德的研究是對「精神病患」，同性戀因此是「精神病患」。

除了前述的強迫異性戀婚姻軌道以外，「必須要生孩子」，才是正常的發展，是另一個清楚的訊息。吳書（1999：82）引介的另一個大師艾利肯孫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中，「（七）繁衍對停滯：壯年期在此時期的發展，如果能夠擴張自己的興趣，並關懷社會，生產、照顧和指導下一代，將可為社會造福；反之，如果只顧自己興趣，無視於生命延續，則將會有「靜止不前」的感覺。」如此的論述，為所有的人預設的生命軌道，就是生產下一代的天職，無子的人（尤其是女性），被污名簡化為「只顧自己興趣，無視於生命延續」，排除她「為社會造福」的可能。

吳書（1999：83）在摘要引介大師理論後，在教育上的啓示還特別強調從佛洛伊德的觀點而言，「重視家庭教育和人格發展的重要性，家庭破壞或失和，將會導致兒童認同的困難，這對目前日益增多的單親家庭，應有一些警惕作用。」家庭破壞或失和，會對兒童的認同產生影響，但是不一定是直線因果關係，後半段卻有污名化單親家庭之嫌疑。單親的成因很多，單親家庭不必然導致兒童認同困難，很多在具備雙親家庭表象中成長的兒童，也出現認同困難。但是這樣的論述，讓來自單親家庭卻正常成長的讀者，覺得自己的出身充滿問題。

八、教師作為教育中的主體，假性別中立，漠視女性的多重身分困境

四本教科書在提及教師的主題時，除了呂書(2000:373)以性別刻板「慈母般的愛心」來說明對教師的期待，其他幾乎是去性別的，因此，就不會討論到性別角色的社會期待，如何影響女性大量投入國小教育工作，如何迫使國小男性教師追尋行政主管的工作，解決社會對於男性功成名就的壓力(齊宗豫，2001)。教師的工作，被認為最適合女性，因為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去性別化的討論，隱藏教師多重性別角色處境的真實存在，漠視女性教師必須特別在多重角色中掙扎的困頓。例如，吳書(1999:123)提到進修是教師的義務，重點放在理想理念的陳述，但是卻避開第一現場在職教師真實面臨的性別角色處境，如何的影響他/她們的進修機會與意願。性別角色的社會期待，讓國小大部分的女性教師，面臨家庭責任與進修工作難以得兼的困境，對男性教師而言，就比較不是問題。這個困境可以如何解決，它不只是個別教師或個別家庭的問題，更是整個在職進修的機制可以如何地考量到制度性的鼓勵女性進修的措施。只有深入的提供性別平權的教師進修視野，吳書(1999:133)或許比較有可能協助讀者全面的回答「一位教師，如何釐訂一份自我成長企劃書？」這種去性別化的作業。

九、校園性騷擾的討論，去脈絡化與忽略身體自主權

吳書(1999:128)中與性別議題最直接明白相關的，出現在標題為「師生相處，拍拍肩可以嗎？」的「教育相對論」的版面框框。在這一個人人想要一窺究竟的標題下，吳書正反各列出四個理由¹⁰。從這些正反兩面的論點對比中，吳書的立場為何，並不清楚。最可惜的是，吳書完全避開最關鍵的師生權力不對等的問題，也看不到身體自主權的概念。另外，「師生相處，拍拍肩可以嗎？」的問題，用這種去脈絡化的正反理由，其實簡化了教育現場師生互動關係的微

¹⁰ 這四個正反理由如下 1.「它是一種良好的互動關係的表現」，相對於「部分老師心懷不軌，易流於性騷擾。」 2.「表達師長對學生的關懷」，相對於「對學生關懷，不一定要拍拍肩、摸摸頭，還有其他替代方式。」 3.「有利於實施情感教育」，相對於「易引起學生不必要的幻想。」 4.「增進師生之間的距離，有助於師生之間的瞭解」，相對於「師生宜保持適當距離，避免扛上罪名產生師生戀等後遺症。」

妙內涵，甚至過度簡化性騷擾的議題¹¹。

吳書(1999：133)也在「思考問題」作業中，特別出了一題：「目前教師性騷擾時有所聞，一位教師如何拿捏，避免此種醜聞事件發生？」足以證明吳書很重視這個議題，但是，如果以吳書所提示的資料，讀者很難提供除了消極保持距離以外的答案。從這個考題來延伸，一位老師也不是只拿捏自己的性騷擾醜聞事件，如果是自己班上的學生被人性騷擾，該如何處理？如果加害人是自己的同事，該如何處理？如果加害人是家長，該如何處理？也有可能是學生同儕的性騷擾行為，例如掀裙子、摸性器官、用性器官的名詞嘲弄同學等等。所有這些都凸顯，只有從師生權力關係、性別權力關係的雙重向度深入探究，才能協助準老師回答這個作業問題，因此在教科書文本中很有必要提供國內有關兒童性騷擾處理的相關資料，例如：人本教育基金會出版的「如何面對兒童性騷擾」。

十、對女性角色的刻板期待或責難

在少數幾個明顯出現女性的段落，則看到性別刻板。例如，吳書(1999：242)建議學校重視親職教育之推動，包括成立媽媽成長團體、善用母姊會等。這個刻板排除了父兄參與的可能，學校親職教育很容易成為以女老師為主，跟女性家長的對話，現在很多學校發現母姐會命名的不當，因此改為比較平權的親師懇談會。另外，我也看到責難職業婦女的論述，例如呂書(2000：4)在初等教育的範圍小節中提及「由於職業婦女日間工作的關係，無法妥善照顧幼齡子女，基於實際所需，學前教育無異為其提供適當的環境，減少父母的精神負擔。」言談之中，隱約可見性別分工的刻板與不當歸因，因為婦女投入就業市場，所以「無法妥善照顧幼齡子女」。在社會學理論章節中，呂書(2000：176)再度責怪職業婦女「基於工作關係無法充分照顧子女等現象」，加上小家庭替代大家庭制度，「均使得家庭中組織成員關係流於疏遠，親情趨於淡漠，形成所謂的疏離感。」不只不利兒童行為發展，也不利社會關係的和諧。婦女就業成了社會不安的原因，在感嘆大家庭制度被取代的同時，也忽略大家庭往往是父權制度

¹¹ 例如，雖然被拍的人覺得不舒服，就構成主觀上的騷擾，但是被拍的人卻不一定就會告對方「性」騷擾，拍拍肩膀也有可能伴隨其他動作、語言、表情、對話，換句話說，回答這樣的問題，必須理清當時的脈絡，才不會淪為將現代的學生污名化，好像只要「拍肩」，動不動就告教師，難怪師院現場常常可以聽到教師要自保的論述，卻不知道性騷擾的受害者都是要經過多麼大的心理掙扎，才會提出控訴。

展現對女性壓迫最冠冕堂皇的場域。

伍、結論：開創女性主義教育知識的空間

這個研究所描繪的，雖然不是多麼美好的教育景觀，但是，師資培育教育工作者除了勇於面對，事實上沒有悲觀的奢侈。美國學者 Michael Apple (1979: 13) 在深入分析「霸權」如何透過學校知識生產與分配的過程細緻運作指出，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努力了解知識選擇分配的機制，並且重新學習它們，我們應當謹記在心：「那些控制我們的機制性和文化性的安排，事實上也是我們一手建造的存在，我們當然也可以重新建造它們。」

從前述的研究發現中，師資培育者比較有可能開始在師資培育的現場，細緻地掌握教育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進而思考可以如何更有策略、更有系統的跨出自己的領域，一起聯盟、合作、建立網路，改寫或重新建造師資培育的景觀，包括轉化、改寫不當的教科書內容、拒絕使用不當的教科書、發展書寫屬於女性主義教育學的教科書。Antonio Gramsci 的名言「思維上的悲觀，意志上的樂觀」，或許是開創女性主義教育知識的空間較建設性的態度。當師資培育者的課程與教學能夠有意識地重視性別議題，以及將性別、種族、階級等議題，從邊緣移到中心，勇敢地面對這些議題時，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建造一個不一樣的職前師資培育的景觀，造就出一批有著社會批判視野與改革行動能力的準老師。

(本文改寫自 2002/9/28 台灣女性學學會年會論文，感謝台灣女性學學會補助研究助理費。)

參考資料

- 王雅各(譯)(2002)。C. Gilligan 著。**不一樣的語音**。台北市：心理。
- 李元貞(1993)。**體檢小學教科書——主題體檢：兩性觀**。台北市：台灣教授協會。
- 李筱峰(1996)。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文化衝突。載於張炎獻、李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頁 273-302)。台北市：玉山。
- 林玉體(1993)。**西洋教育史**。台北市：文景。

- 危芷芬、陳瑞雲（譯）（1996）。B. Lott 著。**女性心理學**。台北市：五南。
- 張國興（1996）。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社會的變化（1937-1945 年）。載於張炎獻、李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頁 55-77）。台北市：玉山。
- 黃政傑（1994，5 月）。**兩性教育與課程設計**。論文發表於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主辦之『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嘉義縣。
- 黃政傑（1988）。生活與倫理課本教些什麼？載於**教育理想的追求**（頁 111-123）。台北市：心理。
- 游鑑明（1988）。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0)，353。
- 歐用生（1989）。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型態之分析。載於**質的研究**（頁 99-177）。台北市：師大書苑。
- 歐用生（1988）國民中小學教科書中的性別意識型態。載於**教育與意識型態**（頁 255-272）。台北市：師大書苑。
- 簡成熙（2002）。一位男性教育研究者的性別自省。載於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主編），**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頁 15-26）。台北市：女書文化。
- 廖鳳池（譯）（1992）。**教育心理學**。台北市：心理。
- 齊宗豫（2001）。男性 VS. 國小教育工作—一段對生命經驗的探索歷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7，54-65。
- 婦女新知（2001）。多「原」文化教育，教什麼？怎麼教？**婦女新知通訊**，226，12-15。
- 錢樸（譯）（1995）。S. Delamont 著。**博學的女人：結構主義和精英的再造**。台北市：桂冠。
- 蔡美玲（譯）（1995）。M.F. Belenky, N.R.C. Goldberger & J.M Tarule 著。**對抗生命衝擊的女人**。台北市：遠流。
- 劉惠琴（1999）。女性主義與心理學。載於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頁 134-175）。台北市：心理。
- 劉鳳英（2000）。**家庭、工作與女性主體：五位國小女性主任追尋自我的生命史研究**。國立花蓮師院國民教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縣。
- 蘇芊玲（1997a）。**從教材看女性的教育處境**。論文發表於『第二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教育議題次論壇』。
-

- 蘇芊玲 (1997b, 9月4日)。體檢國小新教材的兩性觀。中國時報，開卷版。
- 蘇芊玲、劉淑雯 (1997, 6月)。檢視國小一年級國語科新教材兩性觀。論文發表於台北市教育局主辦之「體檢國小新教材的兩性觀」研討會，台北市。
- 魏慧娟 (1994, 5月)。國中國文教科書兩性形象與角色分析。論文發表於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主辦之『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嘉義縣。
- Apple, M. (1979).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New York: Routledge.
- Aron, I.E. (1977). Moral philosophy and moral education: A critique of Kohlberg's theory. *School Review*, 85, 197-217.
- Barnartt, S. N. (1995). Medical sociology textbooks reconsidered. *Teaching Sociology*, 23, 69-74.
- Beeman, M., Chowdhry, G. & Todd, K. (2000). Educating students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An analysis of university sociology texts. *Teaching Sociology*, 28(2), 98-115.
- Campbell, P. B. & Sanders, J. (1997). Uninformed but interested: Findings of a national survey on gender equity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8(1), 69-75.
- Diessner, R., & Simmons, S. (Eds.). (2000). *Notable selection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 Dushkin/McGraw-Hill.
- Dunn, K. (1993). Feminist teaching: Who are your students?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3(4). 39-45.
- Foley, T. & Safran, S.P. (1994). Gender-biased language in learning disability textbooks.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27(May), 309-314.
- Foxman, E., & Easterling, D. (1999).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versity in marketing principles text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74(5), 285-288.
- Gannon, L., Luchetta, T., Rhodes, K. Pardie, L., & Segrist, D.(1992). Sex bia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rogress or complac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389-396.
- Gentile, J. R. (1997) *Educational psychology*. Dubuque, Iowa: Kendall/Hunt.
- Gilligan, C. (1979). Women's place in man's life cycle.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49(4). 431-446.
-

- Gilligan, C. (1985). *Remapping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Toronto.
- Higginbotham, E. (1990). Designing an inclusive curriculum: Bringing all women into the core.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1(2), 7-23.
- Hogben, M., & Waterman, C.K. (1997). Are all your students represented in their textbook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overage of diversity issues in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textbooks. *Teaching of Psychology*, 24(2), 95-100.
- Hurd, T., & Brabeck, M. (1997). 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Gilligan's ethic of care in college textbooks, 1970-1990: An examination of bias. *Teaching of Psychology*, 24(3), 159-167.
- Levine, C., Kohlberg, L., & Hewer, A. (1985). The current formulation of Kohlberg's theory and a response to critics. *Human Development*, 28, 94-100.
- Martin, J.R. (1982). Excluding women from the educational real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2(2), 133-148.
- McCarthy, C. (1990).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minority identities, textbooks and the challenge of curriculum reform. *Journal of Education*, 172(2), 118-129.
- Noddings, N. (1995). "A morally defensible mission for school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hi Delta Kappan*, 76(5), 365-368.
- Ogbu, J. (1992).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learn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1(8), 5-14.
- Peterson, S.B., & Kroner, T. (1992). Gender biases in textbooks for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and hum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6, 17-36.
- Sadker, M. & Sadker, D. (2000). *Teachers, schools, and society*. (5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 Sadker, M. & Sadker, D. (1980). The one percent solution? Sexism in teacher education texts. *Phi Delta Kappan*, April, 550-553.
- Slavin, R.E. (1997).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Sommers, C.H. (2000).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 Titus, J. J. (1993). Gender messages in education foundations textbooks.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4(1), 38-44.
- Wood, J. T. (1991). Politics, 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text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0 (January), 116-123.
- Wright, R.A. (1995). Women as “victims” and as “resisters”: Depictions of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in criminology textbooks. *Teaching sociology*, 23, 111-121.
- Zittleman, K. & Sadker, D. (2002). Gender bias in teacher education texts: New (and old) lessons.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53(2), 168-80.

附錄：教科書檢視清單

- 王家通主編（1992）。**初等教育**，（初版）。台北市：師大書苑。
- 呂愛珍（2000）。**初等教育**，（初版十一刷）。台北市：五南。
- 吳清山著（2001）。**初等教育**，（二版四刷）。台北市：五南。
- 陳迺臣、呂祖琛、林萬義、蔡義雄（1998）。**初等教育**，（初版二刷）。台北市：心理。